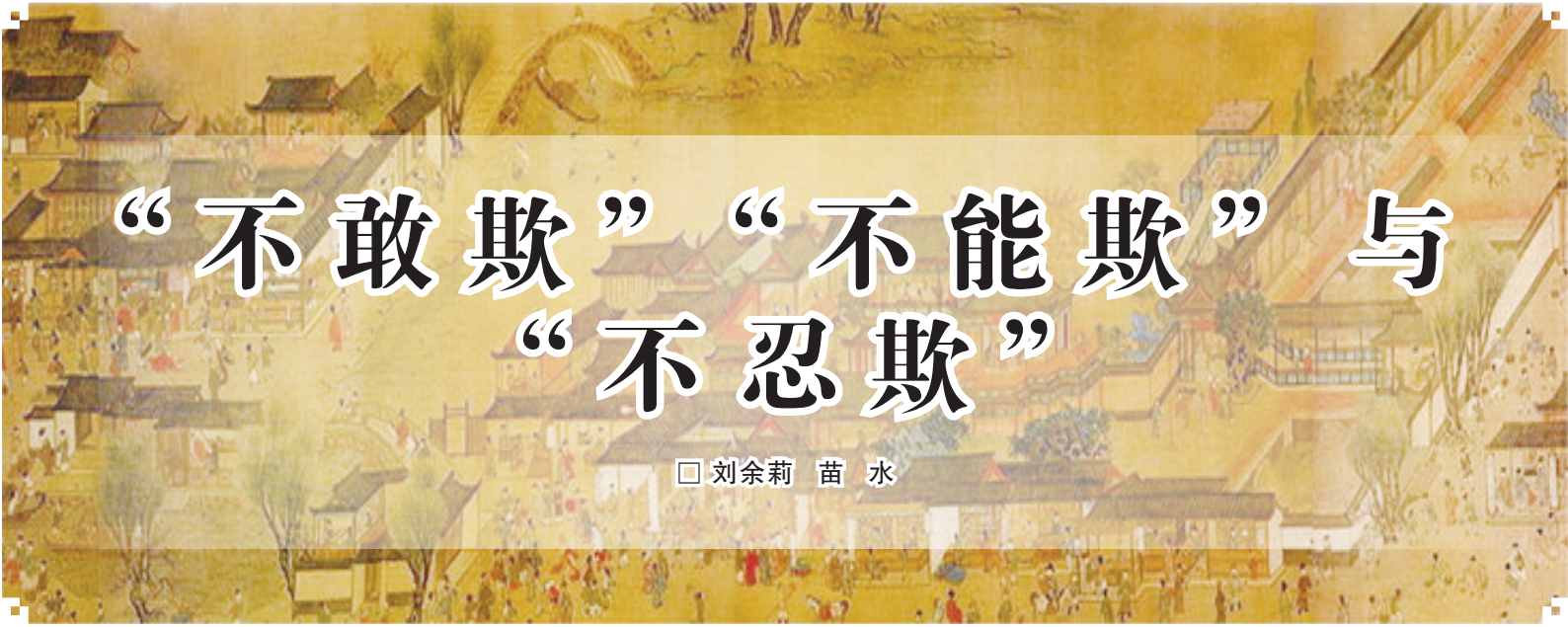




“不敢欺”“不能欺”与“不忍欺”

□ 刘余莉 苗 水

从历史上看，中国之治所能达到的境界是“不敢欺”。《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种治理境界：春秋时子产治理郑国，严密的法律和监督机制使人不能作恶，达到了为政“不能欺”的境界；战国时西门豹治理邺县，通过设置严厉的法律制度，使人不敢作恶，达到了为政“不敢欺”境界；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宓子贱治理单父，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义忠恕与治理之道相结合，使人不忍心违法乱纪，达到了为政“不忍欺”境界。

《淮南子》中记载，宓子贱治理单父三年，巫马期前往观摩治理效果，见到一人在夜色下捕鱼，但却屡屡把捕得之鱼释放回去。巫马期间捕鱼者为何如此，捕鱼者回答：因为长官宓子贱不让人捕取小鱼。通过捕鱼者的行为，可以看出，子贱把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孔子认为，子贱的治理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是因为子贱做到了“诚于此者形于彼”。百姓被子贱的至诚心所感化，故不忍心欺骗他，社会治理自然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

与西门豹的“不敢欺”、子产的“不能欺”相比，子贱的“不忍欺”显然更胜一筹，是更高层次的治理境界。《群书治要·体论》中也讲到：“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

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在《盐铁论》中，对刑罚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一个比喻：刑法对于治理国家，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就去赶车，而是拿着马鞭而不轻易使用。圣人借助刑法来实现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罚便可以搁置不用。这就是《尚书》上所说的“刑期于无刑”。设立刑罚是起到警戒的作用，其最终目的是使人不触犯法律。通过为政以德达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是中国之治的标志性特点之一。

关于如何实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群书治要·傅子》中讲：“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换言之，实现善治，既需要完善的治理体制，也需要具备治理能力的管理人才。如果缺乏德才兼备的管理者，就只能达到“不能欺”和“不敢欺”，而无法达到“不忍欺”的最高治理境界。

治理者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实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治理者必须承担三种角色：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治理者既要承担率领、引导、管理的职能，还要关爱属下，甚至要像父母关爱儿女那样关爱属下，正如《六韬》中所讲，善于治国者，对待人民如同父母关爱子女，兄长慈爱兄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春秋左氏传》中也记载：“国之兴也，视民

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此外，治理者还要承担教导属下的职责，特别要教导以“五伦八德”（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而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是为入师表、上行下效。正如《说文解字》释“教”为“上所施，下所效也”。孔子也强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治理者唯有正己化人才能达到良好的治理境界，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因此，孔子特别强调治理者的道德引导和礼仪教化作用，因为这样可以培养、引发民众的羞耻心，使百姓心悅诚服归附。不仅如此，能够起到君、亲、师作用的治理者还可以“绝恶于未萌”“防患于未然”，将问题与矛盾杜绝和处理在萌芽阶段，并领导民众在进德修业的正确道路上不断前进。这些都是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要达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就必须秉持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的治国理念，提倡治理者先受教育。因此《大学》中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盐铁论》中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在《淮南子》上也说，“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墨

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可以说，正是通过治理者为政以德的修身和率先垂范的教化，才能令百姓信服，达到“不忍欺”的治理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伦理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国家治理体制的完善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贤人君子，并把贤人君子选拔到领导之位这一核心而展开。因此，从教育制度开始，就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试、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学而优则仕”“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等原则，保证了“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其治理结果如《六韬》中所言：“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

总之，重视发挥管理者为政以德的教化功能，强调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以此达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推动下，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得到流域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批文化工程正在规划酝酿，相关创作与研究工作者积极展开，黄河文化建设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观。如果从史学工作的角度出发，作为国家战略的黄河文化建设，与一般性的文化建设相比，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国家战略层面的黄河文化不可“失焦”

我们日常谈论的黄河文化，可以指历史与现实中与黄河相关的一切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实践活动，其主体是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黄河文化的博大决定了人们对其的认识必然见仁见智，这亦是黄河文化深入人心且富于生命力的表现。但当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时，必须体现出国家意志的清晰指向。历史上，国家文化战略的“失焦”有着深刻的教训，而“聚焦”亦有着生动的经验。

战略性的文化建设活动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一贯传统，包括典章厘定、史书编写、文学创作与大型书籍修撰等。国家以制度与财力对这些文化建设活动给予充分的保障，一大批重要文化成果应运而生。历代“正史”的修纂、《皇览》到《永乐大典》等类书的编制、鸠摩罗什与玄奘的佛经翻译、《昭明文选》到《全唐诗》等文学总集的修纂等，无不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然而这些由国家推动的文化工程，对于国家自身的命运却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姚秦政权大力资助译经，却因无补于治理很快灭亡；梁武帝与隋炀帝时期重视修纂文集类书，却变相助长浮华政风，最后酿成颠覆性危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化战略“失焦”的表现。相形之下，唐太宗支持魏征等名臣以“务乎政术，存乎劝

戒”为宗旨摘录出《群书治要》、以总结前代得失为目的大力推动《隋书》等前代史书编写，暂停一般性文集、类书等编纂，使文化战略聚焦于为治国理政提供支持，为“贞观之治”的形成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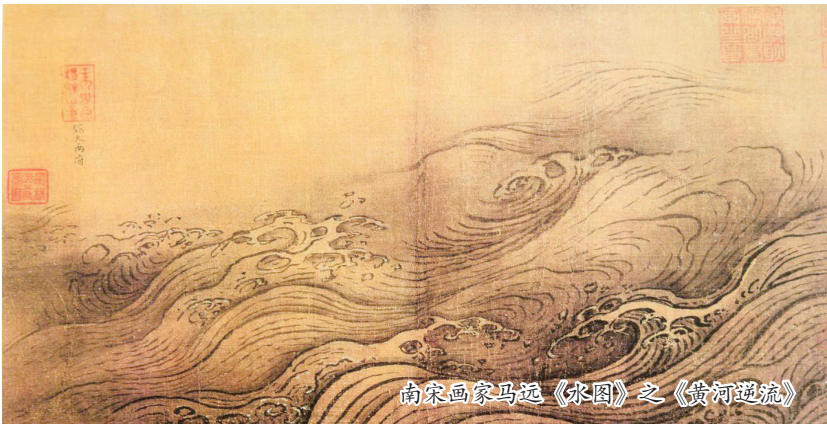
因此，作为国家战略的黄河文化传承、保护、弘扬，必须首先明确焦点；这个焦点，就是要服务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为黄河流域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焦点清晰，具体工作中的抓手才能明确，才能有针对性地扎死寨、打硬仗，诞生一批既服务现实又影响深远的重大文化成果。在焦点任务之外，与黄河相关的一般性文化工作，不用担心因此受到忽视，业已成熟的分工体系可以保证其与国家战略并行不悖。宣传与党史部门重视好黄河流域红色基因的传承、史学工作者搞好黄河相关的历史研究、文物工作者搞好流域内的文物保护、文艺工作者提升与黄河相关的创作水平，都是在为黄河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唯有焦点清晰，黄河文化传承、保护、弘扬工作才能产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真正把“中华民族根和魂”守护好、发展好。

治水文化建设应是黄河文化国家战略的核心之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水”是多次出现的重要关键词。水资源保护、解决好水沙关系、推动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等无不与

永葆黄河文化的生命力

□ 张景平



南宋画家马远《水图》之《黄河逆流》

“水”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早在神话时代黄河流域就是大禹治水的主战场，黄河治理又与历代各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观察，治水文化都在黄河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科技文化是黄河流域治水文化的底色。汉代以来，前人在黄河治理特别是下游防洪方面形成复杂的技术体系，道光年间成书的《河工器具图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黄河堤防建设中每一种工具、每一类预制件的详细图文记录。近代以来，李仪祉等现代水利先驱提倡科学治河；新中国成立以来，河流动力学等相关学科飞速发展，当代治河方略的制定已从经验归纳走向数字模拟论证，治河事业根本改观。我们应当深入分析古代治河史中技术扮演的复杂角色，大力宣传现代科技对于黄河治理的决定性贡献，用科技的视角和观点为黄河文化的当代复兴赋予新的方向感。

制度文化是黄河流域治水文化的核心内容。漫长的治河历史浸润着中

国政治与社会文化中发达的制度要素，黄河流域现代治水制度的发展就是生动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前，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职能设置明显有祖述清代河道总督的痕迹，陕西、内蒙古等地的灌溉管理机构则借鉴了传统水利共同体的组织原则。为了应对20世纪50年代黄河、淮河等流域严峻的水旱灾害，从中央到地方防汛抗旱指挥机制逐步建立，突破行业与部门局限的防汛抗旱工作成为政府处理非常规事件能力的主战场之一，为建立现代国家应急管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经验。黄河流域治水制度体现出的管理机制、动员体制、政府行为规律等制度文化要素理应得到充分重视，将为当前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借鉴。

生态文化是黄河流域治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患是中国最古老的生态问题之一，下游泥沙淤积与中游植被破坏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清代已为有识之士所重视。在黄河上、中游，藏族与蒙古族同胞关于河流的种种信

历史上的“变法”，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历史上的“新政”，有王莽新政、庆历新政等；历史上的“改革”，有孝文帝改革、张居正改革等。往事越千年，以大历史观之，中国呈现的历史常态是变革的此起彼伏，经久不衰。变革如一剂良药，早变早强，大变大强，不变者必衰亡。

纵观中国历史，那些锐意变革的先驱者担当者，大多具有非凡的气度才情。管仲被誉为“天下之才”；桓公有不记“带钩之仇”的雅量；商鞅“年虽少，有奇才”；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唐太宗“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后来的改革家，如范仲淹、王安石等，都是人品才华堪称一流的人物。清末主持变法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则是一批忧国忧民、才兼中西的精英人物。这绝不是偶然的。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意识、没有洞察利弊得失的睿智、没有坚毅果断的意志，变革的壮举无从谈起。

能不能将改革推行到底决定了战国七雄的最终命运。秦外六国的改革也曾取得显赫的业绩，尤其是管仲相齐，魏国李悝变法、吴起改革，中不治治韩，分别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改革，先后称霸于中原，左右着天下的大局。但它们的改革都不够彻底，浅尝辄止，没有真正持续地深入下去，因而只能强盛一时。秦国则不然，它的发展水平远比其余各国落后得多，作为“西陲小国”，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但其“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却非常坚决彻底。在经济上，废除井田制而厉行耕战政策；在政治上，厉行法制，铲除奴隶制特权；在军事上，颁行20等军功爵制而“壹民于战”。经济、政治、军事等诸方面相互结合，长期奉行，坚持不懈。这是其余各国所不能比的，秦国因此迅速富强起来，后来居上，最终完成统一大业。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机对事物的变化发展，往往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社会仍处于繁荣发展时期，由于承平日久，安于故习，因循守旧的思想往往很严重，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关键在勇于开拓。汉武帝时代的军事改革就是这样。在武帝之前，西汉长期受匈奴的威胁，强大的匈奴铁骑经常南下，不仅袭掠北部边境地区，有时居然直逼汉都长安。到武帝时，西汉经过70余年休养生息，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出现空前繁荣发展的局面，具备了大规模改革军队、建设骑兵、转变战略、战胜匈奴、解除边患的条件。在新的形势下，大多数勋臣宿将仍然固守以往的“和亲”之策，不敢同匈奴抗衡。汉武帝则以其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紧紧抓住这一历史

变革是历史的常态

□ 李 峻

良机，力排众议，决心实施战略转变，整顿京师大、北军，建设强大的骑兵，提拔重用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高级将领，并制定17级武功爵奖励战功。经过这一改革，军队的面貌为之一新，终于战胜匈奴，解除边患，促进了祖国边疆的大规模开发和统一。

清末，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变法改制：裁汰冗员、撤减衙门、废八股、倡实学等。但这场变法从开头到终结不过区区百日，便被反变法的势力扑杀。晚清的社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可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守旧势力当局者迷，以为混下去没问题，一百个不愿意改。戊戌维新提出的要求很温和，掌握大权的人却视新的思想和技术为“夷夷小技”，一点变动都接受不了。国家命运又与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争端搅在一起，从而错失良机，耽误大局。等到问题的积累超出了临界点，再想变革也没有机会了。

中国史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中国之所以成为泱泱大国，华夏文明之所以有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与不断地通过改革以吐故纳新有重要关联。

级政府文化建设的主要形式之一，成绩固然明显，但大型丛书质量参差、内容驳杂，数据库难以拓展兼容、不便实际利用。今日的黄河文化建设，应当充分顺应研究精细化、传播网络化的时代潮流，文献整理应在质量而非规模上下功夫，数据库建设应考虑现有数字资源的有效整合。

黄河文化建设要体现地域分工、行业协作。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修纂中，各方志在不离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于体例安排、文献剪裁方面都有各自的风格，其中佳作迭出。清代末年，学部下令各地编纂风土志，条目化的指导意见把富于创造性的修纂活动变成了填表，成书质量不高。黄河流域内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故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各省去黄河文化建设不宜过分整齐划一。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战略的黄河文化建设应积极采取各行业协作的方式。如治水文化建设，曾被视为水利系统内部的行业性文化活动，但事实上牵扯到的行业很多；故在学术上应引入多学科展开综合研究，水利、文保等部门联合构建黄河流域治水博物馆群，教育部门主导黄河治水故事进课本、进校园，外宣、外交部门积极推动黄河治水经验走向国际、形成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

近代学者张君勱曾提出，中华文明的发展，先后经历黄河时代、长江时代与珠江时代。事实上，中华文明的复兴不能在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缺席下实现。作为国家战略的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必须立足历史、面向现实、展望未来，为将黄河流域从民族诞生的摇篮变为民族复兴的热土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为永葆黄河文化“其命维新”的生命力做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

